

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五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学会学术部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3

ISBN 7-80092-900-0

I . 社… II . 中… III . 社会主义建设 - 成就 - 中国 -
1949~1999 IV .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254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永清县第二福利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1.5 印张 6 插页 1018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6.00 元(上中下三册)

目 录

曲折探索时期的光辉业绩

-
- | | |
|---|---|
|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共和国初创辉煌的七年
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 | 张启华·1·
杨德明·29·
田居俭·48·
陈 夕·68· |
|---|---|
-

建国初期我国高校的

- | | |
|--|--|
|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新中国初期禁毒运动的
伟大胜利与思考
论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 赵寿莲·88·
王 玥 叶 蔚·106·
孙慧荣·117· |
|--|--|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 | | |
|--|------------------------------------|
| 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战略
建国初期中美对抗的原因
及对今天中美关系的启示
新中国的对外战略及雅尔塔体系 | 迟爱萍·133·
陈 理·151· |
|--|------------------------------------|

坍塌后所面临的挑战	刘淑岷·178·
1956—1966 年的国际形势	
与我国的外交政策	田 波·190·
新中国解决澳门问题的努力	陈立旭·211·
<hr/>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	
理论与实践	陈世润 江宏龙 熊杨勇·224·
新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	黎青平 易希康·240·
一九九二年我国的对外开放	崇庆余·252·
<hr/>	
论党的两次工作重点转移	萧栋梁·264·
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李正华·275·
国有经济管理的历史性转变	叶 青·296·
厦门特区的历史性巨变和经验启示	刘正英·307·
五六十年代浙江包产到户的理论探索	金延锋·321·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制的改革	赵 明·332·
当代中国改革的特征、方向和意义	张 涛·352·
<hr/>	
社会主义使河南人民	
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走向富裕	胡悌云·364·
河南“一五”时期的建设成就和经验	段德文·380·
河南教育五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徐玉坤 孙增福·393·
新中国使黄河的	
治理变成现实	张孟军 张建军 季文选·404·
沧桑半世纪，荒山变新城	

——从平顶山市的崛起，看新中国 50 年的伟大成就

周书亚 王谨瑶·418·

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过热现象及其启示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蒋仲辉·427·

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李 宏·446·

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的艰辛努力

陈东林·459·

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

蒋永青·476·

从大接到大接管的伟大进步

廖信春 杨发祥·496·

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权建设的

成就与经验

阎书钦 申玉山·512·

曲折探索时期的光辉业绩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经济建设

张启华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十周年，全党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之际，我们也不能忘记共和国建立的最初二十多年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曲折探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尽管这段时期犯过严重的错误。

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56 年上半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七年，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头三年，中国共产党根

据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并通过统一财政经济体制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为此,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来解决这一矛盾。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矛盾基本解决,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状况,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基础。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毛泽东适时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至1966年5月“文革”发生前,这十年的主线是,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如果说建国后头七年历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在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改造生产关系上的话,那么这十年的特点可说,重点是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意味着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关系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

基本解决。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只是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远未完成，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显然是很不充分的。为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这种新的不相适应的矛盾，从总的方面来说，党和国家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加速发展生产力。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有了现实的可能。所以，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久即提出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而制定的、直接与“一化三改”总路线相衔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国防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完整提出。正式将“四化”作为党和政府的总任务，是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1957年后，发展生产力，为在我国实现“四化”而奋斗，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工作的重心。这十年以及1966—1976年进行的“三五”和“四五”、“五五”（1976年）计划建设，都是按照这一战略目标进行的，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在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力求探索建立一种适合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在那几年里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原先，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

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在中共八大后提出一个“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他把这称作是“新经济政策”^②，认为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他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在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把个体经济作为补充、把资本主义经济也作为补充，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尽管这个认识没有付诸实践，但他毕竟提出了要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生产关系问题以适应现实生产力状况的观点。与此同时，陈云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但同样没得到实践。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大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估计得过高。50年代后期，由于缺乏清醒认识，又提出并执行了许多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最突出的就是盲目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果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更加不适应，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经过几年努力，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关系调整得比较合适了。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调整了城镇手工业所有制结构，对那些转为全民所有制后，对生产不利、对居民不便的手工业合作社，采取适当步骤退回来，并强调了家庭手工业的作用；在农村，允许社员保留宅旁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等。二是在对待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方面，正式决定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

队)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当时解决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一条路子。这段道路虽说充满曲折,但从总体上说是由失误归于正确,意义是重大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诚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应有所区别的是,在这十年中,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二、建国头七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时，继承的是极落后的烂摊子。与解放前的最高年份 1936 年相比，1949 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 50%，农业总产值下降 20% 以上，粮食平均亩产仅 68.5 公斤。物资极端匮乏，人民得不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在工业中心上海，主要行业的工厂也只有 1/4 开工，大米、煤炭、棉花奇缺，一度只够供应顶多一个月。从工农业比例看，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 70%，工业总产值占 3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 17%。工业不但比重小，且门类不全，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布局看，70% 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现代工业。交通和通讯设备也极为落后。铁路从 1876 年到 1949 年的 73 年间共修建 2.2 万公里，而在 1949 年时能勉强通车的只有一半；公路有 1/3 不能使用。农业生产是与古代没多大区别的手工操作。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财政经济状况也十分混乱。一是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市场投机势力猖獗，三是庞大财政赤字的存在。

如此破败不堪的国民经济，严重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解放后头三年，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加上原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建

立起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为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物质前提。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市场物价，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体制，使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对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又大量节减了国家机构的经费，经过三年努力，到 1952 年经济已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达到近代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为 1.9 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7.5%（比 1936 年增长 20%），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为 1.7 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

在农业方面，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加之大规模水利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52 年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农业总产值超过 18.5%，粮食增长率超过 9.3%，棉花增长率超过 53.6%。农业的发展，不但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而且为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工业方面，全国财政经济体制统一后宏观经济环境改善，促使工业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国家挤出大量资金在三年中新建了三千三百多个企业。还从国外引进一些技术设备，对原有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进行了初步改进，使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到 1952 年，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30%上升为41.5%，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份1936年约增长22.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52年不仅大大超过1949年的水平，而且大多数产品产量还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例如，1952年比解放前最高水平，钢产量增长46.3%，发电量增长21.7%，原煤增长6.5%。工业的地区分布，除东北地区及沿海城市的工业继续得到重点恢复和发展外，内地也建设起一批小型工业企业，使原先工业分布不平衡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

交通运输事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旧中国，交通运输几乎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人民政府在三年恢复时期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17.7亿元，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26.7%。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2.3万多公里，接近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新建的铁路有成渝路、天兰路、来睦路等线，总长1263公里。此外，宝成路、兰新路、丰沙路等线也动工修建。从1949年到1952年，新建公路3846公里，全国的公路通车里程由86068公里增加到126675公里，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内河通航里程也由1949年的73615公里增加到95025公里。至于民用航空，我国刚解放时没有航线，到1952年已有航线13123公里。

国内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解放初，国内外贸易都基本处于停顿、呆滞状态。国内城乡物资交流不畅，对外贸易则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为此，人民政府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到1952年底，已在全国基本形成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合作社商业为

助手、联系城乡小商小贩的新贸易网，各种商品的零售额、批发额、流转额等都有很大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发展得到国家的格外重视，大量国营商业机构建立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我国成立了国营对外贸易体系，取消帝国主义在对外贸易及有关的外汇、金融、航运、保险、商检等方面的垄断，把对外贸易的大权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在扩大与苏联、东欧等国贸易的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也积极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到 1952 年，我国先后同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同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以及英国、法国、瑞士、西德、芬兰、荷兰、智利、日本等国建立或发展贸易关系。1952 年与 1950 年相比，进口总值为 1.75 倍，出口总值为 1.34 倍。进出口总额，1950 年为 41.6 亿元，就已超过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1951 年为 59.5 亿元，1952 年为 64.6 亿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初步改善。物价稳定，特别是粮食、棉布及各种日用品的价格稳定，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城乡人民的收入也得到提高。到 1952 年，农户均收入比 1949 年增加 30% 以上，人均消费水平约增长 20%。在城市，政府通过解决劳动者就业问题、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实行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等，也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52 年比 1949 年，全国大学生增长 63.1%，中学生增长 148%，小学生增长 109.5%。在医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到1952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比1950年增长33.3%;医院床位比1949年增长1倍多,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长1.7倍。当然,这还只是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从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来说,当时中国无疑仍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人民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

不能忽略不计的是,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不可能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我们不得不分出很大部分精力打仗,且要确保战争胜利,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战争胜利放在第一位。财政上就必须适当增加军费支出,相对减少建设项目的经费支出。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还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使我国无法对外开放,难以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做生意。然而,战争和封锁并未吓倒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国民经济依然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

此后很长时间内,我国都面临极不利的国际环境。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使我们得不到多少外来援助或支持。二十多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国际条件下,奋发图强,不屈不挠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

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发展。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力很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因而就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及社会经济结构而言,仍属相当落后。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1953年起,我国

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苏联等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于 1956 年底提前完成，到 1957 年底，即超额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各领域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工业建设飞速发展。不仅原有的工业企业得到大规模改建、扩建，而且大批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基础工业也迅速建立起来。重工业方面，能源基础、原料基础的建设以及机器制造业都发展迅速；轻工业方面，建材、森林和纺织工业等都有一批重点项目投产。一批中国过去没有的现代化工业骨干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以及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等，都纷纷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使我国的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有了明显改变，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建立起来了。到 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 128.6%，钢产量达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96%，为 1949 年的 33.9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5.8 倍；原煤产量比 1952 年增长 96%，为 1949 年的 4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2.1 倍；发电量比 1952 年增长 166%，为 1949 年的 4.5 倍，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 5.2 倍。

农业生产方面，国家对水利的投资额达 41.8 亿元，新增灌溉面积近 2.2 亿亩，造林 2.1 亿亩，建成大型水库 13 座，扩大耕地面积 391 万公顷。这些对改变农村面貌，发展